

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

——国外研究述评

张世平

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是国际学术界长期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以韦伯为代表的“障碍论”，统治国际学术界达半个世纪之久。5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东亚经济奇迹出现以后，强调儒家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的“有利论”，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但是，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种多维的互动关系，因为文化因素是通过社会体制等中介变量而起作用的。文化与社会体制的变革不断互动，相互影响，促进经济的发展。

作者：张世平，男，1963年生，现就读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博士课程。

一个世纪以来，关于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的争论，始终未平息过。在国内，孔圣人的命运更是几经沉浮。从康梁的托古改制，至五四运动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到民国时期的尊孔，从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再到毛泽东晚年的批林批孔，儒家文化的命运何等的坎坷！儒家文化成为不同时代政治上的旗帜和靶子。在台湾省，60年代的柏杨也曾经把儒家文化贬为“酱缸文化”，中国人丑不堪言。

在国际学术界，儒家文化的境遇也并非迥异。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曾经颂扬过儒家文化的政治上的“仁政”理念。黑格尔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位对儒家文化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他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是一种僵死的文化。20世纪初，韦伯在分析为什么近代的资本主义首先出现在西欧时，对比中西经济与文化的差异，断言儒家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韦伯的“障碍论”统治国际学术界达半个多世纪。^①但是，正如同当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时，“西方文化优越论”盛极一时一样，到本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的出现，使不少学者重新认识儒家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而韦伯的“障碍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本文将综述国际学术界关于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理论，从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阐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此外，本文还将从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角度，分析为什么儒家文化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境遇。

① Kjeld E. Brodsgaard. "Western Studies on The Role of 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 in the Modern World: A Survey", In *Indi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0) Vol. 2, NO. 2, PP74-91.

一、韦伯主义的“障碍论”

韦伯的关于新教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一的理论,是建立在对中西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在回答为什么资本主义会首先出现在西欧这一问题时,韦伯认为导致理性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因素有:理性的企业组织、理性的会计制度、理性的技术、理性的法律和理性的经济伦理(*economic ethic*)^①。在分析加尔文教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时,韦伯主要是从社会体制(*institution*)和文化两个方面阐明其内在联系的。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近代西欧社会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过程的组成部分。而新教的产生与宗教革命,是使西欧社会克服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实现理性化的最重要的历史因素。新教传播理性的文化价值,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健全与发展。新教灌输一种“入世”观念,把创业、禁欲、节约、自律等视为完成上帝的召唤(*Calling*),成就人生的理性手段。新教要求人们去征服自然,征服世界,因此它具有一定的扩张主义倾向。而中国的儒教文化虽然也倡导一种理性的精神,但却要求人们去适应社会生活,达济天下,困善其身。同时儒家文化尊尚古制,是一种回顾性的文化,而非一种前瞻性的文化。

此外,儒家文化所模塑下的中国社会,与西欧社会相比,还具有如下特征:(1)中国的城市没有自治地位,政治重心在皇都;(2)缺乏理性的会计制度与企业组织;(3)达官贵人将资金用于购买土地,而不是投资于商业;(4)士阶层的“反商业”文化障碍了经商创业精神(*entrepreneurial spirit*)的传播。

韦伯认为上述这些儒家文化模塑下的社会特征,足以说明这种文化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障碍。韦伯的理论影响了几代汉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研究。费正清和怀特是韦伯主义的典型代表。

费正清的中国历史研究主张采用“影响—反应”范式(*impact-response paradigm*)。在与西方接触之前,中国社会几乎处于静止的状况,没有经历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中国的儒家文化与社会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缺乏应有的生机与活力。经过与西方文化的撞击,中国社会才真正被纳入到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因此,费正清认为19世纪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唤醒了中国文化的现代意识。^②

怀特在分析同治中兴之后中国的变法维新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孔教孕育的这种社会制度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大的障碍。士阶层花费大量的财力和精力从事诗书词画,附庸风雅;而经商成为受人谴责的离轨行为。政府关心的是恢复政治——道德秩序,而不是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怀特认为在这样的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内生型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产生于中国的。^③费正清和怀特的观点在六、七十年代的汉学界影响非常大。

① 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1950.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② 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5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et al: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939-193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③ 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195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二、对“障碍论”的挑战

在 50 年代末,美国社会学家白勒赫的《近代日本的文化根源》一书,首次对“障碍论”提出挑战。白勒赫是帕森斯的学生,也是一名功能主义的社会学家,重视对价值体系的研究。他认为儒家文化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经济的起飞,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日本,儒家文化孕育了一种目标取向的政治文化和理性的经济伦理。在回答为什么儒家文化在中日两国起着不同作用时,白勒赫认为日本的儒家文化重视“目标达成的价值观念”(goal-attainment values),中国的儒家文化倡导“体制—维持—整合的价值观念”(system-maintenance-integrative values)。因此,中国的儒家文化的功能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现状,而不是鼓励人民去开拓疆土,追求财富。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任何变法维新的计划终将为这种僵化的官僚体制所扼杀。

由于东亚的经济在七、八十年代全球不景气的条件下一枝独秀,因而儒家文化成为国际学术界相当热门的题目。学者们不仅批评了韦伯的“障碍论”,而且在韦伯的关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的理论启发下,深入地探讨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受儒家影响的社会到底具有哪些独特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条件。

米策泽尔在《走出困境》一书中,对韦伯的理论假设进行了批评与修正。他认为韦伯误解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因为朱熹的新儒家思想并不是缺乏活力的和静止的。儒家文化不一定成为社会经济障碍。中西文化的撞击不但不会导致中国文化的衰落,反而有利于使中国文化内在的活力激发出来。韦伯研究的是内生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受内部社会因素的制约,而且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因此,韦伯当年关心的是近代资本主义没有出现在中国的原因;而今天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解释促成泛中国文化区经济成功的文化和社会的原因。^①

三、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儒家文化

日本在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是 10%。亚洲四小龙从 60 年代到 80 年代的平均增长率是 7%。被称为亚洲的巨龙的人民中国,在过去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在 21 世纪是亚太的世纪的惊呼声中,也许儒家文化大放异彩的世纪是一句绝妙的潜台词。未来学家凯恩认为儒家文化使东亚国家和地区具有迎接未来挑战的文化优势。儒家文化倡导忠诚、献身精神、责任感、集体主义,这些文化价值为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②

德巴理提出“后儒家时代挑战”的理论,以概括东亚地区的经济奇迹与传统文化并存的现象。他认为古代儒家文化有三个社会体制的阵地:家庭、学校和国家。在现代社会,因为西式的教育和政府取代了旧式的教育与政治体制,儒家文化是主要通过家庭的社会化过程来传播的。儒家文化为社会所有的成员提供了共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儒家的家庭伦理(family eth-

^① Thomas Metzger.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② Herman Kahn,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79 and Beyo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ic)辐射到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领域,成为社会的凝聚力的基础。^①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派也强调家庭在东亚文化区的重要作用。齐家是治国的前提,家庭的行为规范是政治行为规范的基础。派根据不同的社会化特点和父亲的不同角色,把儒家文化分成中国型、日本型和朝鲜型。中国社会里的父亲,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中国人注意家庭关系的和谐。在日本社会里,父亲主外,母亲也要分担教育子女的义务。日本人注意培养人在家庭以外的进取心。朝鲜型则介于两者之间。派是政治文化学派中的心理—文化论者。他认为中日政治体制的差异源于中日两个社会的父子关系的观念的差异。中国人重视“整合性”的价值,日本人重视“目标达成”的价值。^②索罗门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只有研究中国人的社会化过程,才能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特点。家庭的长幼有序的家训教育是遵从政治权威的最基本的训练,是中国人进入政治生涯的敲门砖。^③

此外,不少学者还研究了东亚地区的工联主义现象(政府、企业、工会之间的合作性的关系)与儒家文化的关系。由于儒家文化培养了社会成员的团结、和谐的价值观念,各种社会力量的关系的性质也与西方国家的情况大相径庭,这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四、问题与讨论

到底应当怎样认识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上面介绍的“有利论”出笼之后,近年来学术界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有些学者认为“有利论”忽视了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的作用。其次,在中国文化中,不能排除道教、佛教和法家思想的影响。^④有的学者以泰国的例子来反驳“有利论”,强调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经济上也取得很大的成就。因此,不能忽视东亚文化的多样性。

在反驳“有利论”的争论中,约翰逊的观点影响较大。约翰逊认为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微乎其微。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是它们拥有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政府。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有两类政府,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管理性(*regulatory*)的政府,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一类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发展取向”(*developmentalist*)的政府,直接参与经济计划的制订与实施,从民族经济利益的角度,协调经济的发展。正因为这种“发展取向”的政府能够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使东亚地区的经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能抓住时机,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⑤

但是为什么东亚区会出现这样成功地干预经济活动的政府?为什么这样的政府在英美会受到人们的敌视和反对?这些韦伯式的经典的问题,是从约翰逊的理论中找不到满意的答案的。这也说明忽视文化对社会体制及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是不能对经济发展的原因作出科学

① W. Theodore De Bary: (eds)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East Asian Civilizations: A Dialogue in Five Stag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② 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③ Richard H.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④ Gung-wu Wang: "Trade and Cultural Value: Australia and the Four Dragons", in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Review, Vol. 2, NO. 3, pp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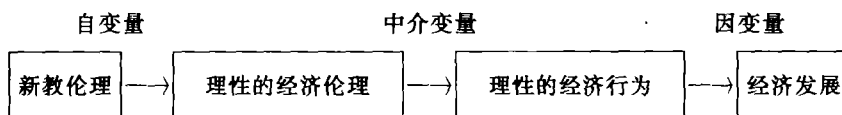
⑤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的和满意的解释的。

任何一个成功的理论尝试,都不能够回避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到底应该如何认识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韦伯首先提出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理论,我们不妨以下列模式来概括他的新教与资本主义产生的关系的理论:

同时,韦伯在强调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时,并没有忽视社会体制的中介作用。从理论上讲,中介变量的研究对揭示事物之间复杂的联系,是十分重要的。人们生活于工作于不同的社会体制与组织中,价值观念和人格也直接受到社会体制的塑造。文化与社会体制的关系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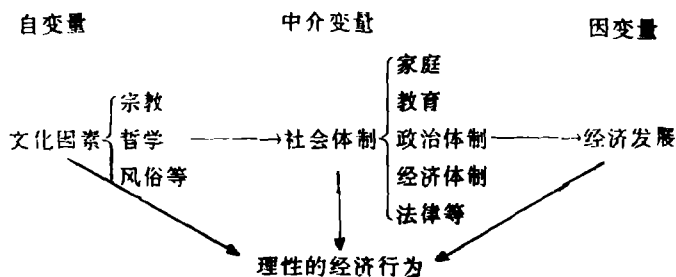
图 1 韦伯的理论模式



一种互动的关系。文化传统影响社会体制的形成与变化;后者的变化也会引起文化价值的变化。例如我国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男女平等的观念取代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文化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因为文化是不可能离开社会体制而存在的,后者对社会生活起着根本的和直接的作用。我国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而我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后完全是两个世界。同样的文化背景下,同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最重要的变量。不实行和建立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体制,如市场经济,再悠久灿烂的文化遗产,也无济于事。

因此,“儒家文化强调政府的领导作用、孝道、社会的纪律和团结,这是培育不同于欧美传统的政治体制的文化土壤”。^①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在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和中介关系。如果忽视这些联系和中介关系,而空洞地谈文化的影响,必然会陷入唯文化决定论的泥潭。文化因素与社会因素是相互联系的,前者只有通过后者才能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

图 2 文化因素、社会体制和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综合模式



① Kong Yam Tan: "Pattern of Asian Pacific Economic Growth and Implication for China", In Symposium o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Beijing, Oct, 1989.

在争论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不同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在我国多次被“批倒批臭”,成为封建文化的代名词。在官方不提倡的条件下,儒家文化还有无影响?在日本、韩国,儒家文化多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针对这一问题,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彼得·博格认为儒家文化实际分为“雅儒文化”(high confucianism)和“俗儒文化”(vulgar confucianism)。所谓“雅儒文化”是作为朝廷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所谓“俗儒文化”是作为生活于天高皇帝远的环境中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伦理((work ethic)的儒家文化。^①

博格认为“雅儒文化”具有保守、反对革新变法的性质,也就是韦伯所指的障碍现代化的儒家文化。但韦伯并没有注意到作为中国下层人民的劳动伦理的儒家文化的作用。广大的下层劳动人民,虽然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儒家经典的训练,在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创造活动中,发展了自己独特的亚文化。这种亚文化倡导节俭、吃苦耐劳、守纪律,是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经过家庭的熏陶,这些文化价值世代相传,成为泛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发展也是人的发展(human development),人的素质(包括文化素质)会在一定程度决定一个民族的技术与经济的竞争力。我们不妨在研究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同时,也探讨一下一个国家的文化实力。儒家文化使东亚地区具备了很强的文化实力。

为什么儒家文化在不同时代有不尽相同的境遇?为什么孔圣人时而被捧上天堂,时而被打入地狱?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任何文化、意识形态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环境里。要理解文化的作用,必须从文化的社会环境与人的关系角度,揭示任何一种文化对不同阶层和不同时代的人所具有的不同意义。文化的意义是社会中所赋予的。因此,“打倒孔家店”是要打倒封建统治阶级,“批林批孔”的目的是批林;柏杨骂的不是孔圣人,而是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文化专制统治;“儒家文化优越化”的背后是经济奇迹出现以后,东亚地区人民的自豪感的增强。文化的社会意义与社会功能是所有争议的焦点。这些争论折射了社会生活的风风雨雨,在争论者头脑里的儒家文化与真正的儒家文化风马牛不相及。正如凯特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发展是与民族主义密不可分的。^②一旦中国实现了四化,成为一条巨龙,谁还会贬低儒家文化的价值,挖掘国人的劣根性?

责任编辑:谭 深

^① Peter L. Berger. "Cultural Identity and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In Proceedings of Kokugakuin University Centennial Symposium, Institute for Japanese Culture and Classics, Kokugakuin University, 1983.

^② Gavin Kitching.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Toutledge. 1989.